

谭五昌——主编

2 0

1 8 年

# 排行榜

## 中国新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新诗

ZHONGGUO

XINSHI

PAIHANGBANG

20  
15  
年

谭五昌

主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WX19N1065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8年中国新诗排行榜 / 谭五昌主编.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9.8

ISBN 978-7-5613-9808-1

I. ①2… II. ①谭…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33225号

## 2018年中国新诗排行榜

谭五昌 主编

---

选题策划	刘东风 郭永新
责任编辑	张佩
责任校对	郑若萍
封面设计	龚心宇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a href="http://www.snupg.com">http://www.snupg.com</a>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5.25
插 页	1
字 数	190千
版 次	2019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978-7-5613-9808-1
定 价	59.00元

---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029) 85303879



· 谭五昌 ·

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毕业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兼任贵州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自 2011 年至今，发起并主持年度“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自 2013 年至今，担任“中国新诗排行榜”系列图书主编。自 2016 年起，发起华语诗歌春晚。曾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诗意的放逐与重建——论第三代诗歌》《见证莫言》《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海子诗歌精品》《“我们”散文诗群研究》及《在北师大课堂讲诗》（五卷本）等学术著作及诗歌类编著三十余种。

《2018年中国新诗排行榜》是对2018年中国新诗创作风貌与扎实成绩的整体呈现与集中展示。全书从个人记忆写作与历史想象性写作、底层写作、生命写作、神性写作、先锋写作、智性写作与形而上写作、地域性写作与游记写作、审美写作等多维艺术向度，客观呈现了2018年中国新诗写作的美学生态与多元格局，视野宏阔，兼收并蓄。既选入了诸多诗坛大家与名家的精品力作，展示出选本的深厚底蕴，也遴选了诸多海内外实力诗人的优秀作品以及不少诗坛新人彰显非凡潜力的诗歌文本，使得该选本充满艺术创造上的逼人锐气与无限活力。

## 《2018年中国新诗排行榜》编委会

---

主 编：谭五昌

副主编：远 岸 唐成茂 许耀林（澳大利亚）

---

编委（排名不分先后）：

吉狄马加	叶延滨	曾凡华	潞 潞	陆 健
梁 平	张清华	树 才	高 兴	臧 棣
李少君	龚学敏	黄亚洲	高 凯	祁 人
周庆荣	侯 马	车延高	潇 潇	梁晓明
庄伟杰	阎 安	阎 志	梁尔源	姜念光
李 云	柏常青	刘以林	石 厉	冰 峰
鲁若迪基	李 犁	周占林	梅 尔	雁 西
王霆章	刘 川	沙 克	喻子涵	李 强
唐 诗	唐德亮	田 禾	张 民	顾 北
罗 晖	南 鸥	韩庆成		

---

## 2018年中国新诗之一瞥

与2017年这个充斥着各种关于中国新诗百年纪念活动的热闹年份相比，2018年是诗坛回归平静的一年，因为新诗的第一个百年已经完成，而新诗的第二个百年，悄悄开启它的旅程。面向过去的怀旧情绪与展望未来的憧憬心情，构成了当下诗人伤感与喜悦相交织的复杂心态。在现代汉语诗歌（新诗）世纪（百年）更迭的背景下，诗人的历史意识与代际意识变得分外自觉而强烈。一个典型的现象是，每当一位富有影响的前辈诗人去世，都会在后辈诗人那里掀起情感的波澜，后辈诗人也都会在潜意识中感叹一个诗歌时代在离我们远去。例如，在华语诗坛享有广泛声誉的前辈诗人洛夫（1928年出生）于2018年3月19日在台北逝世，迅速在海内外广大诗人与诗歌爱好者中间产生非常强烈的反响（这种情形与2017年余光中、罗门、屠岸等前辈诗人的逝世在诗坛上引起的强烈反响是一样的），人们纷纷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表达对前

辈诗人逝世的沉重哀思。不少诗人是以写诗的方式来抒发自己对前辈诗人洛夫的深切缅怀之情。例如诗人雁西在洛夫逝世当天便创作出了悼念性诗作《悼洛夫先生》，该诗对洛夫的诗人形象、诗歌成就与艺术抱负给予了生动、到位的描述与评价，令人感触颇深。而洛夫的私淑弟子、旅居加拿大的宇秀在为洛夫先生创作了情真意切的悼念性诗篇后，又为随后去世的著名科学家霍金创作了悼诗《斯蒂芬·霍金》，该诗所表现出来的对一位世界科学奇才与巨匠的悼念与敬仰，及世人普遍性的缅怀之情，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对诗坛前辈洛夫逝世的惋惜与悲伤情绪的投射与延伸。

综观2018年的中国新诗创作，它在一种平静、内敛的状态中呈现出比较扎实的创作实绩。从诗歌写作美学价值取向的宏观层面着眼，可以把2018年度的诗歌创作大致归纳成八种写作向度。

### 向度之一：个人记忆写作与历史想象性写作

一般而言，写作都是对个人记忆的一种审美观照与艺术呈现，近些年的“记忆诗学”便是对诗人的个人记忆写作的理论概括与学术命名，因而这种写作向度充满审美韵味与艺术化的情感色彩。从心理学的层面来看，记忆写作通常带有怀旧情绪。

许多诗人喜欢将童年作为个人记忆写作的素材与内容。这已经成为诗人的一种审美趣味或审美惯性。2018年，不少诗人对童年进行书写，产生了一批艺术品位较高的诗歌文本。例如，侯马的《备好了椽》以诗人童年时候的一场迁徙经历为书写对象，通过质朴、自然的语言，以“椽”为代表，把诗人对“家”温馨与稳定的渴望，真实、生动地表达出来了。作品

以平静的语调呈现了“我们家”的漂泊命运及诗人对“我们家”的感恩心态，由此表现出该诗的内在张力。高凯的《侠客：儿时的梦》以明亮的笔调回忆了诗人小时候的一个游戏记忆片段，用俚俗、简洁、幽默的语言描述了儿时小伙伴们打斗嬉闹的场景。该诗对“三”的民谣化叙述，凸显了文本中乡村文化的喜剧色彩。大枪的《我为一顿肉记住了父亲》则以反讽的笔调书写自己童年时代为去世父亲守灵、送殡的一段痛苦记忆。诗人运用生动的细节描写来表达自己小时候对吃肉的强烈本能渴求，吃肉欲望的满足，与诗人早年丧父的不幸遭遇构成强烈反差，给读者带来巨大的心灵震撼。简言之，诗人对童年苦难记忆的艺术化书写，是非常打动人心的。

一些具有乡村背景的诗人，喜欢将乡村与母亲形象作为自己记忆书写的对象与内容。在这些诗作中，乡村形象与母亲形象往往有意无意地叠合在一起。例如，冷先桥的《老屋的柴门》将回忆的焦点聚集到故乡的一扇柴门上，通过对柴门所象征的贫困乡村生活的描写，诗人塑造了自己母亲贫穷但又可亲、可敬的形象。诗作所传达的乡村情感质朴而动人。与冷先桥的《老屋的柴门》构成某种对应，唐诗的《每当母亲弯腰》则通过对母亲弯腰咳嗽的艺术化想象与生动描述，刻画出了一位被生活压弯了腰的乡村母亲形象，令人难以忘怀。罗振亚的《母亲简历》则以自己母亲的一生经历为表现内容，通过母亲对当下城市生活的不适应与孤独无聊，回溯母亲充满不幸的一生。诗作语言朴素，语调平静，但内在情感沉痛而苦涩。远心的《一次又一次摇上来》对童年时期母亲在严寒天气里摇井水、挑井水的情景进行了回忆性的描述。诗作中的场景与细节描写生动、细腻，令人如临其境，情感淳朴而深沉。与此相反，一些具有城市背景的诗人，其记忆书写则超逸了乡土题

材，展现出更为开阔的视野。比如，肖黛的《所以在苍笼怀念老昌耀》以自己与已故诗人昌耀的一次梦中相会为书写对象，两位诗人的思想、性格乃至命运层面的相似与相通，使得这种记忆写作升华为寻找知音的灵魂自述。作品情感沉郁苍凉。蔡天新的《在我乌黑发亮的记忆里》则叙述了一种非常契合当下这个全球化时代的人物记忆。在诗作中，诗人记忆的对象是一位“来自南卡罗来纳”、有着“一头披散的金发”的外国女郎。作品语言明朗，意象鲜明，充满异国风情。

还有一批诗人，在记忆写作中将目光从个人记忆转向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由于他们的历史记忆书写本质上属于一种关于历史的集体想象，所以他们的集体记忆书写用“历史想象性写作”命名更为准确一些。而这又体现出中国诗人身上的一种源远流长的历史情结。

一些诗人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风云人物与历史伟业作为表现内容。例如，黄亚洲的《京张铁路》以近代杰出工程师詹天佑主持、中国独立建造第一条铁路为主题，对詹天佑别出心裁的线路设计与自己的身体部位进行了大胆而精妙的对应性联想，艺术想象力超拔、脱俗，令人赞赏。诗人车延高与彭志强则将想象性的目光投注到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唐朝身上。车延高的《胡姬》可以视作对伟大诗人李白相关诗作的现代性语言的一次重写，诗人对李白笔下的“胡姬”之美的想象性描写，彰显出浪漫与古典相混合的审美情趣。作品修辞精准，意境动人。彭志强的《在唐城墙遗址：铁发芽》也将主人公设定为唐朝的某位重要历史人物（我们可以猜想为杜甫），与车延高笔下内容有所不同的是，彭志强以安史之乱为诗作背景，用沉重的语调与魔幻的手法塑造了一位忧国忧民的唐朝诗人形象。曾凡华的《文武之道——关于老谢大谢与小谢》则以东晋历史上谢氏家

族的三位名人谢安、谢玄、谢灵运为书写对象，对谢家这三位杰出代表的生平爱好、历史业绩与艺术形象进行了生动的叙述与描画。“真的很酷”这种当下流行性评价语言在诗作关键位置的出现，让作品产生了亲切、幽默的艺术效果。安娟英的《包孕吴越》则将历史想象的目光拉到春秋战国时期，以充满江南情调与古典意趣的语言与意象，呈现出历史想象与虚构当中灿烂的吴越文化风貌。周庆荣的《在丁村》将怀古的目光回溯到几千年以前中华文明的萌芽时期。诗人在诗中称自己“看到先人的头骨”，“露齿而笑”，这种超越时空的出色想象给人以恍兮惚兮之感。作品语言明快、简洁、准确，富有语感，艺术效果平中见奇。有些诗人还将历史想象的触角伸向西方历史与西方人物。例如，李东海的《写给康德》动用了诗人对西方一代杰出哲学家的深入了解与热爱，在一场想象性的心灵对话中，生动地勾勒出了康德与众不同的精神肖像。盛华厚在其情爱诗篇《爱琴海的缪斯——给萨福》中则将自己的情爱诉求对象投射到希腊历史上的伟大女诗人萨福身上。作品的心灵自叙色彩与异域风情形成了颇为奇妙的“混搭”效果。

此外，蓝帆的《无字忧伤》、徐良平的《古井》、黄海兮的《大道》、陈泰灸的《这个冬天我只负责滴水成冰》等诗歌文本也可归入历史想象性写作范畴之中。简单说来，诗人的个人记忆写作与历史想象性写作存在互为补充的关系。它们一个指向个体生命经验，一个指向集体经验与历史记忆，由此构成诗人记忆写作的完整链条与精神空间。

## 向度之二：底层写作

进入21世纪，大量的底层民众进入城市务工谋生，而这

个数量庞大的社会群体也需要表达自己的心声。诗坛上出现的底层写作或打工诗歌便是其必然的现象与结果。原则上说，底层写作是指写作者以底层民众的写作立场、文化心态与价值观念来从事写作，重点书写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即使书写自己的经历，也是把自己作为社会底层的“草根”人物（普通人物）来看待，从中表达底层民众的思想情感、价值诉求与审美趣味。

一般说来，进行底层写作的诗人通常出生于农村，有着贫困的生活经历，或者出生于城市底层，家境艰难。例如，出生于湖北农村、有着深刻的贫穷乡村生活记忆的诗人田禾，虽然现在生活于大城市武汉，但他的诗歌写作仍常常以底层农民的生活状态为题材。这展示出诗人的草根文化立场。2018年，田禾的《红薯》可谓典型的底层写作诗歌文本。毫无疑问，在这首诗的语境中，红薯是底层农民生命形态与生存状态的象征与隐喻。诗人对红薯生长过程及其生命状态予以了质朴、形象、有力的描述，红薯的普通、卑微与坚韧，正是底层民众形象与品质的生动写照。胡建文的《跟着父亲上山》为我们展示了一位八十岁高龄的乡村父亲等动人形象。这首诗对通过父亲上山栽树、引导诗人巡查自家土地的情景的描述，凸显了中国老一辈农民的勤劳品质以及深入骨髓的土地情结。诗作语言明白如话，情感质朴深沉。阿琪阿钰的《我的父亲母亲》以极为朴实的语言叙述了自己的父亲母亲在外打工所遭受的不幸。青年诗人不动声色的语气背后所流露出来的对父母的血缘深情，感人肺腑。杨北城的《铁匠铺》则将目光对准下面临淘汰命运的乡村铁匠铺，对乡村底层人物老铁匠落魄形象的生动描写，以及所透露出来的忧伤情绪，使人久久难以忘怀。诗作语言简洁、生动，富有金属般的质感。程立龙的

《环卫工老马》以极为朴实的口语，描述了一个处于城市最底层的环卫工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表达了诗人对底层人物命运的深切同情。柯桥的《大雪》则以充满泥土气息的语言与真实的细节描写，刻画出底层农民的本色形象，表达了诗人对底层穷人窘困命运的深切同情。霍竹山的《认识贫困》是对当下部分底层人民困苦生活的概括性描述。诗人调动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以口语方式对贫困山村的荒凉情景予以了真实的再现。李皓的《狗尾巴草》以拟物的手法、自白的方式生动而形象地描述了狗尾巴草的生存状态，而在该诗的语境中狗尾巴草就是底层民众的隐喻或写照，从中可见诗人自觉的草根心态。与前面几首底层写作诗篇的沉重情绪基调有所不同，晓音的《我要去寻找我的兄弟》以心灵独白的手法表达了诗人对亲情的重视与珍惜。在这首诗中，诗人选择在夏天出门去寻找自己的兄弟，强调或渲染出一种温馨、热情与明朗的心境。

还有一些诗人，在进行底层写作或底层叙事的时候，不仅仅满足对底层人民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描述与揭示，而是进一步深入底层伦理的探讨与思考层面。例如，刘川的《贵客》对贫寒之家来了贵客无论如何都要想方设法杀鸡，或杀猪杀羊予以款待的情况进行了口语化的叙述。诗作的出彩之处是作品的结尾，六岁的孩子对贫穷父母的发问：“家里来的到底/是贵客/还是一把狠心的刀子”。这个孩子童言无忌的发问，直白、坦率、尖锐，击中要害，把许多贫寒之家为了应付社会性礼节而遭受的痛苦生存体验完全揭示出来了。作品中孩童角度的巧妙运用，对穷人道德观念的某种迂腐或虚伪予以了强烈的质疑，体现出诗作立意的深刻与高远。与此相类似，刘频的《野猪岭师公的祭语》通过一位民间祭师面

向山神姿态虔诚的祈福祷告，表达对坏人损害与破坏老百姓庄稼不法行为的强烈愤慨与道德谴责。诗中这位民间祭师的祭语实质上就是底层伦理的诉求，诗作语言质朴、幽默、生动，充满民间审美文化趣味。唐晴的《一个人的力量是弱小的》以底层民众孤立无援时内心深处对侠客的想象与渴望为叙述对象，表现了诗人站在社会弱势群体立场对正义、公平的伦理诉求。作品语言简洁、有力，触动灵魂。

### 向度之三：生命写作

生命写作的最主要特点是指诗人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来表达对生命与外部世界的内在感受，生命体验与生命意识是生命写作的核心内涵。简单来说，生命体验的真实性、深刻性、丰富性与复杂性，是衡量生命写作的重要尺度与标准。

与往年一样，2018年的中国诗坛，涌现了一大批质地优良、富有特色的生命写作诗歌文本。潘洗尘的《有哪一个春天不是绝处逢生》以大雪覆盖母亲墓地为情感的激发点，对母亲的去世表达了一种痛彻肺腑的生命体验，并且用生与死的激烈搏斗来展示诗人灵魂深处的情感挣扎与精神突围。诗作语言态度真诚、坦白，情绪跌宕起伏。张焯的《最后的青春》是对已经逝去的青春的一次心灵祭奠，对生命的黑暗、困顿与失落境遇发出了灵魂“带血的呼喊”。这种生命抒情的强度给人以情绪上的强烈感染。与张焯的生命抒情强度相类似，刘以林的《自己的血》以独白手法把“自己的血”所代表的生命激情与生命追求，用心灵幻象的方式加以精彩呈现。诗人对生命良知与正义的坚守，闪烁出人性的光辉，诗作语调铿锵有力，仿佛发自灵魂的生命呐喊。潇潇的《我的引力波》将诗思聚焦于自

己与情人在机场告别瞬间的场景描写与情绪爆发，将生命与情爱的漂泊不定感给予了淋漓尽致的表达，女性自白式的叙述呈现出生命之痛感，深深触动读者的心灵。同样地，若离的《贩卖孤独》也以女性自白的叙述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深度孤独。诗作所采用的反讽表现手法更为有力地强化了诗人负面性的生命体验。与潇潇、若离二位女诗人消极性的生命体验、情感表达方向不同，王桂林在《仰望星空》一诗中书写了一位男性在白天仰望星空的奇特生命体验。全诗采用一种魔幻叙事的手法，表现作品主人公（诗中的“他”）精彩、诡异的白日梦。这种心灵幻象的书写可谓超凡脱俗，触及灵魂的隐秘地带。曹谁的《风中听竹叫》采用排比性的修辞手法揭示了人生的种种不如意，所表达的情绪密度很大，充满了生命的痛感体验。田湘的《坐在高铁上还嫌慢》表达了诗人对慢与快颇为独特与复杂的生命体验：一方面，诗人追求快，追求诗歌写作中艺术灵感的快速降临；另一方面，诗人又追求慢，希望时光慢下来，不要飞快流逝，以免经受衰老的烦恼。这种矛盾又复杂的心态被表达得非常深刻、到位，唤起人强烈的心灵共鸣。

还有一些诗人，在其生命写作中灌注了非常自觉而强烈的生命意识。例如，李南的《未来有一天》在未来的时间向度上充满对自己生命的死亡预感，诗人的黑暗生命记忆使得她清醒地保持着悲剧的生命意识。诗作想象丰富，时空大幅度跳跃。李自国的《你将一无所知》以死者的口吻与角度叙述了一段苦难的生命史。诗人生动的死亡想象凸显出强烈的生命意识。谢克强的《活着》，在生命意识的照耀下，把自己作为一名诗人的迷惘、孤独、痛苦体验，上升为对诗歌艺术的追求。诗人把创作的诗歌作品作为生命存在的最高形式，如此就使得诗作的精神境界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层

次。此外，有些诗人还在生命写作中有意识地表达生命伦理观念，例如，徐柏坚的《让孩子们学会善良》用质朴的语言、真诚的态度表达诗人希望孩子们自觉培养善良品质的美好愿望。诗作所表达的生命伦理观念对改进当下的世风人心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值得赞赏。

而在实际的写作情形中，许多诗人在生命意识彰显的基础上，常常更进一步地将生命意识、伦理意识、生存意识以及人性意识自觉或不自觉地结合到一起。例如，鲁若迪基的《我恰巧走在那条路上》、谢小灵的《我和树木是一样的人》、喻子涵的《福泉过客》、阿毛的《反差》、戴潍娜的《悖论》、王伟的《就这样活着》、风言的《日复一日》、黄根生的《头发都看见了》、林秀美的《影子》、冉冉的《星期天上午》、方明的《交会》、孔令剑的《厌食症女孩》、李立的《在太阳城》、舒然的《镜中门徒》、施浩的《十月二十二日：深秋的月夜》、迥迥的《有花开了一夜》、瘦西鸿的《剑气》等便属于这类性质的文本，由此展示出了生命写作审美经验的宽度与厚度。

#### 向度之四：神性写作

一般说来，神性写作建立在生命写作的基础之上，是对生命写作在情感层面的高度提纯与无限升华。神圣性、庄严性、超验性，是神性写作最为重要的三个审美特征。神性写作可以理解为一种宗教性写作，它对诗歌写作美学趣味的世俗化与粗鄙化倾向予以必要而有力的反拨，有效地维护了诗歌本身的艺术与精神尊严。

坚持神性写作向度的当代诗人数量不菲，他们每年都会

为诗坛奉献一批优秀的诗歌文本。2018年，被公认为神性写作代表性诗人的吉狄马加为我们带来了《在尼基塔·斯特内斯库的墓地》。这首诗描述了在罗马尼亚杰出诗人尼基塔·斯特内斯库墓地的见闻与感想，表达了一位东方诗人对一位西方诗人的敬仰之情。诗作所表现的崇拜情结具有宗教体验般的色彩，作品语调沉重而庄严，想象超拔，气氛神秘，境界阔大。南鸥的《月亮走在无人的街道》对月光普照无人街道的动人景象进行了一种陌生化的书写。诗人对月亮与风这些自然景象萌生了一种神奇、静穆的灵魂体验。作品采用了心灵自白的表达方式，语调轻柔，情思纯粹。方文竹的《破阵子》表达了诗人在一个夜晚抛弃一切世俗杂念后孤独、宁静的生命体验。诗作呈现一系列具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心灵幻象，意境空灵、高妙而超逸。

阿信的《写作的困惑》以神性意象“鹰”的创造与写作过程作为叙述内容，在图腾崇拜、诗歌崇拜的情感状态中展示出其神性写作的精神立场。作品构思巧妙，立意深远。三色堇的《暮色停在唇上》书写了诗人对日常生活中许多非凡之物的神秘感受，在面对语言苍白无力的感觉中揭示出神性之物的不可言说性，作品意境幽深。爱斐儿的《此处是莲花国净土》将莲花作为全诗的中心意象与情思激发点。诗作语言纯净，语调庄重，情感体验虔诚、庄重而悲欣交集，意境悠远深邃，充满动人韵味。与爱斐儿不同，王霆章的《平安夜，我看见圣神的微笑》书写了诗人的基督教文化体验。作品形式工整，表达有力。诗作所表现的上帝的悲天悯人情怀令人动容。姚辉的《梨花》则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花儿作为观察与描写对象，以一种悲天悯人的心态赋予了梨花高出凡尘的艺术形象，字里行间充溢着对灵魂境界的执着追求。黄恩鹏的《甘南记》与牛放